

中外合作大学场域下青年“中国叙事”的生成逻辑研究

边璐佳 叶晨

宁波诺丁汉大学,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 本文以文化意义建构理论为核心视角, 将中外合作大学视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意义建构场域”。在此场域中, 中外学生的叙事实践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 而是一个主动的、社会性的意义协商与身份定位过程。本文揭示了叙事在媒介、节点、阶段三个维度上的生成逻辑, 在媒介维度, 通过正式媒介、非正式媒介以及二者协同, 实现叙事平台的策略分化与协同; 在节点维度, 探讨学生“意见领袖”的叙事中介与认同引领; 在阶段维度, 从事件触发期、互动协商期和沉淀固化期讨论热点事件中的叙事动态与认同流变。中外合作大学中的青年叙事在新时代新时期, 已经超越于传播行为本身, 成为一种深刻的教育过程和意义生成实践, 是青年一代在跨文化碰撞中认识自我、理解他者、建构共同意义世界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中国叙事; 中外合作大学; 青年传播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前, 关于“中国叙事”的研究存在一种潜在的“传播者中心”倾向, 即多从叙事主体, 如国家、媒体、精英的意图与策略出发, 探讨如何“讲述”以影响“他者”。然而, 在中外合作大学这一高度互动、日常化的生活教育空间, 叙事的生产与消费、讲述与接收是交织在一起的。青年学生既是叙事的“讲述者”, 也是“接收者”与“再创作者”。他们的叙事实践深深嵌入在课程学习、社团活动、日常社交、新媒体使用等具体情境中。因此, 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需要进一步聚焦: 在中外学生共同构成的互动网络与意义协商系统中, 中国叙事是如何被共同生成、竞争、协商与共享的? 这种基于日常互动的叙事实践, 如何不同于宏大的官方叙事, 并以其具身性、情感性与关系性特质(庞华等, 2025; 王海洋、李晖, 2025)^[1], 更有效地作用于跨文化认同的微观建构过程? 这要求我们将研究视角从“如何讲好故事”的策略层面, 下沉到“故事如何在互动中被共同创造并产生意义”的过程与机制层面。

2 文献综述

2.1 “中国叙事”与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叙事”研究是伴随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深入而不断发展的学术领域。早期研究多集中于“为何讲”的必要性论证与“讲什么”的内容策略探讨(周庆安、刘勇亮, 2022)^[2]。随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成为明确要求, 研究焦点逐渐从单向的“讲述”转向对叙事本身的结构、逻辑与体系的系统性建构(刘涛、刘倩欣, 2022)^[3]。叙事不再仅是传播的内容或工具, 而被视为一种根本性的意义建构与认同塑造方式。国际传播视野下的“中

国叙事”研究, 核心在于探讨如何通过叙事实践, 在多元、竞争乃至对抗的全球舆论场中, 有效阐释中国道路、传递中国价值、塑造中国形象, 并促进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

随着融媒体与数字媒介的深度发展, 研究焦点向策略创新与微观实践下沉。丁秋玲、张劲松(2020)提出融媒体时代需从叙事话语、符号、关系、主体四维度进行建构^[4]。刘涛、刘倩欣(2022)强调需打造“新文本、新语言、新生态”的数字叙事体系^[3]。邓祯(2023)探讨了通过跨媒介叙事实现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升维”^[5]。更值得关注的是“微观实践”与“他者叙事”研究的兴起, 研究不再局限于官方或媒体叙事, 而是深入日常生活与民间实践。柴冬冬(2022)分析了短视频中的乡村叙事实践; 王尧(2023)探讨了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的现代化叙事^[6]; 王海洋、李晖(2025)聚焦于“在华外国人”或“海外博主”通过短视频进行的中国叙事, 发现其能形成超越“自塑”与“他塑”二元对立的“第三方叙事”, 因其“在场者”视角更具亲和力与说服力^[7]。这为本研究关注中外合作大学中多元主体, 尤其是外籍师生的叙事实践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

3 三维透视: 中外学生“中国叙事”的生成逻辑

在中外合作大学这一独特的跨文化场域中, 青年学生的“中国叙事”并非单一、线性的传播行为, 而是一个在多重维度上交织展开的复杂社会实践过程。本文构建了“媒介—节点—阶段”三维分析框架, 以系统揭示其生成的内在逻辑。

3.1 媒介维度: 叙事平台的策略分化与协同

3.1.1 正式媒介: 知识权威型叙事的建构
正式媒介主要包括课堂教学、学术讲座、

官方校园媒体如校报、官网、官方公众号等，其核心功能是传递系统性、权威性的中国相关知识与价值理念。在课堂教学中，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当代中国研究等课程，教师通过课程设计引导学生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文化传统”等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叙事内容呈现出较强的逻辑性与学理性。例如，在中国文化课教研室的国际生课程中，中外学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差异进行辩论，中国学生结合历史背景与现实案例阐释制度选择的必然性，外籍学生则从自身文化视角提出疑问与反思，这种互动式教学推动了叙事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协商。

学术讲座与官方媒体则承担着权威信息发布与主流叙事传递的功能。校园邀请的专家学者通过讲座解读中国政策、文化遗产、社会发展等议题，为学生提供深度认知的渠道；官方媒体平台则聚焦校园内的跨文化交流成果、中国学生的学术成就、传统文化活动报道等内容，构建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叙事，形成叙事的“权威基线”。

3.1.2 非正式媒介：日常体验型叙事的生成

非正式媒介涵盖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Instagram、TikTok等、社团活动、日常社交场景等，其叙事特点是具身性、情感性与碎片化，聚焦于个体的真实体验与生活感知。社交媒体成为中外学生叙事传播的核心阵地：中国学生通过朋友圈、短视频分享家庭生活、城市变迁、传统节日习俗等内容，以“第一视角”展现立体可感的中国；外籍学生则通过Vlog记录在华学习生活的点滴，如尝试中国美食、参与志愿服务、游览历史古迹等，其叙事带有“他者视角”的新鲜感与真实性，更容易引发跨文化共鸣。

社团活动作为线下非正式媒介，为叙事实践提供了场景化载体。中国文化社团组织的书法、民乐、汉服等体验活动，让外籍学生在亲身参与中生成对中国文化的感性认知，并通过人际传播将体验转化为叙事；中外学生共同参与的公益社团、学术社团，则在合作项目中围绕社会议题展开交流，叙事内容从文化表层深入到社会治理、价值观念等深层维度。日常社交中的聊天、聚餐、出行等场景，更催生了即兴化、生活化的叙事，如讨论影视作品、社会热点事件、生活习惯差异等，这些微观叙事构成了跨文化理解的基础。

3.1.3 媒介协同：叙事效力的放大与整合

正式媒介与非正式媒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互补协同的关系。正式媒介提供的权威知识为非正式媒介的叙事提供了认知框架与事实支撑，避免日常叙事陷入片面化与碎片化；非正式媒介的真实体验与情感表达，则弥补了正式叙事的抽象性，增强了叙事的感染力与说服力。此外，跨平台的叙事流动进一步放大了传播效力。课堂讨论中形成的观点，可能通过

社交媒体引发更多学生的参与和讨论；社团活动中的文化体验，可能被官方媒体报道后提升叙事的权威性。这种媒介协同打破了“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的界限，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叙事”传播网络。

3.2 节点维度：学生“意见领袖”的叙事中介与认同引领

在中外合作大学的跨文化网络中，部分学生凭借自身的资本优势与社交影响力，成为叙事传播的核心节点——学生“意见领袖”，他们在中外学生之间扮演着叙事中介与认同引领的角色，推动“中国叙事”的有效流动与意义协商。

3.2.1 意见领袖的叙事中介功能

学生意见领袖的核心作用在于打破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壁垒与认知隔阂，实现叙事的有效转译与传递。一方面，他们将正式叙事中的抽象概念与宏大议题，转化为其他学生易于理解的语言与表达形式。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中外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传递双向叙事。向中国学生传递外籍学生对中国的困惑与疑问，推动中国学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叙事表达；向外籍学生解释中国文化中的深层逻辑与社会现象的背景，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促进叙事的双向互动。

3.2.2 意见领袖的认同引领作用

学生意见领袖不仅是叙事的传递者，更是跨文化认同的引领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叙事实践与行为示范，塑造积极的跨文化互动氛围，推动中外学生形成对“中国”的共同认知。对于中国学生而言，意见领袖的跨文化叙事实践能够激发其文化自信，促使其更主动地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通过倾听外籍学生的叙事反馈，中国学生也能以更开放的视角看待自身文化，实现自我认同的重构。

对于外籍学生而言，意见领袖的叙事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与感染力，能够帮助其打破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形成更全面、客观的认知。意见领袖所倡导的包容、尊重、互鉴的跨文化理念，能够引导外籍学生主动参与到“中国叙事”的共同建构中，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进而推动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此外，意见领袖还会通过组织集体叙事活动，如“中国故事分享会”“跨文化主题辩论赛”等，凝聚中外学生的共识，形成群体层面的跨文化认同。

3.3 阶段维度：热点事件中的叙事动态与认同流变

“中国叙事”的生成并非静态过程，而是随着外部环境与社会事件的变化呈现出动态演变的特征。热点事件作为重要的催化剂，会引发中外学生对中国相关议题的集中关注与讨论，推动叙事内容、叙事立场与叙事共识的动态调整，同时也影响着跨文化认同的流变过程。根据叙事发展的逻辑与认同变化的特征，可将这

一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3.3.1 事件触发期: 叙事发散与认知分化

热点事件的爆发,如重大政策出台、文化盛事举办、社会热点议题出现等会迅速激活中外学生的叙事热情,叙事呈现出发散性特征。此时,学生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信息来源与认知框架,形成多样化的叙事视角与观点表达。中国学生往往更倾向于从历史脉络、现实需求等本土视角解读事件,强调事件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外籍学生则更多基于自身国家的经验与价值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与疑问,部分学生可能因信息不对称或文化差异产生误解。

3.3.2 互动协商期: 叙事交锋与意义共建

随着事件的发展与讨论的深入,中外学生进入叙事交锋与意义共建的阶段。在学生意见领袖的引导与媒介平台的推动下,不同视角的叙事相互碰撞、交流与协商。中国学生通过补充事实信息、阐释文化背景、分享个人体验等方式,回应外籍学生的疑问与误解;外籍学生则在倾听与交流中,逐渐了解事件的全貌与深层逻辑,部分观点可能发生调整。这一过程中,叙事的核心从“差异表达”转向“寻求共识”。学生们会围绕事件的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寻找跨文化的共通价值。

3.3.3 沉淀固化期: 叙事共识与认同稳定

热点事件逐渐平息后,叙事进入沉淀固化期。经过前期的发散与协商,中外学生围绕事

件形成的核心观点与共识,会通过人际传播、社交媒体分享等方式持续扩散,并逐渐沉淀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些共识性叙事会补充和完善学生对中国的认知框架,成为后续相关议题叙事的基础。同时,跨文化认同也在这一阶段趋于稳定。学生们在事件讨论中形成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会转化为长期的跨文化相处态度;对中国的认知从碎片化、片面化转变为系统化、客观化,跨文化认同从表层的情感共鸣深入到深层的价值认同。此外,沉淀下来的共识性叙事还会成为中外合作大学跨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被融入课堂教学、社团活动等场景中,持续发挥对后续学生“中国叙事”生成与跨文化认同建构的引导作用。

4 结语

中外合作大学中的“中国叙事”并非单向的灌输或简单的文化展示,而是一个由中外学生共同参与的、多维互动的文化意义建构过程。其生成逻辑受到媒介特性、意见领袖节点和事件发展阶段的深刻影响。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交织的时代,中外合作大学中的青年叙事,远不止是一种传播行为,它更是一种深刻的教育过程和意义生成实践,是青年一代在跨文化碰撞中认识自我、理解他者、建构共同意义世界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 [1] 庞华,宋铨婧,张欣彤.从文化适配到情感嵌合:潮玩IP的跨文化认同与意义建构——基于主题建模与情感分析的混合方法研究[J].新媒体与社会,1-19[2025-12-15].<https://link.cnki.net/urlid/CN.20250905.1446.006>.
- [2] 周庆安,刘勇亮.多元主体和创新策略: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J].新闻与写作,2022,(12):21-28.
- [3] 刘涛,刘倩欣.新文本新语言新生态“讲好中国故事”的数字叙事体系构建[J].新闻与写作,2022,(10):54-64.
- [4] 丁秋玲,张劲松.融媒体视域下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建构[J].学习论坛,2020,(12):12-19. DOI:10.16133/j.cnki.xxlt.2020.12.002.
- [5] 邓祯.跨媒介叙事: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升维[J].中国编辑,2023,(10):79-84.
- [6] 柴冬冬.话语生产、视觉建构与再媒介化——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实践[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3(06):56-65.
- [7] 王海洋,李晖.凝视、互动、认同:跨文化传播中的三层意义建构——以B站海外博主的中国文化反应视频为例[J].新媒体公共传播,2025,(01):127-135.

作者简介: 边璐佳(1993.12—),女,汉族,浙江宁波,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生,高等教育学。叶晨(1998.11—),女,汉族,浙江舟山,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生,国际教育。

项目信息: 本文系宁波高等教育学会2025年度研究课题《中外合作大学中外学生“中国叙事”的生成逻辑与跨文化认同建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